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一家之言】	我在文革漩涡中（选载之一）	聂元梓
【往事非烟】	五十年前我见证的人大血腥武斗	陆伟国
【亲历者言】	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选载之二）	陈楚三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一家之言】

我在文革漩涡中（选载之一）

• 聂元梓 •

第三章 工作组时期

◇ 工作组进校和“6·18事件”

1966年6月1日，受北京新市委的派遣，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开始陆续进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是个老同志。当时，我们就觉得他们取代彭真、刘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来学生们是很拥护他的，因为他是被新北京市委派来领导运动的，可是，他有些方面做得不好。工作组以反右的经验来对待文化革命。一进学校就把群众分成左、中、右，选拔积极分子。你刚来，什么都不了解，谁是积极分子，那就是看出身。当时下面有一种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无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呢？红五类，谁是革命的对象呢？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这种形而上学的看法，非常有害。

这时候，陆平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他自己受到批判，他住的院子也不安宁，有学生往里扔砖头，还有人扒墙头监视他，等等。工作组先是叫陆平劳动，这也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做法，下台了，犯错误了，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就先参加体力劳动，听候上级的处理。陆平就在校园里拔草，结果呢，他一出来，外地和外单位到北大来看大字报的许多群众特别是一些好奇的青年学生，就去围观，还有人辱骂他，这样造成的影响很不好。看到这种情况，我当时觉得，虽然陆平犯了错误，但是在公开场合出现这种现象也是不应当的。我就给工作组提意见，不要让陆平在校园里劳动，以避免被人围攻。后来工作组就把陆平关起来，不让他露面了。

与此同时，各个系里也闹起来了。在批判校党委的同时，各个系的学生和老师，追着系里的系主任或者是党总支书记，向他们发难，要他们回答问题，搞得他们很狼狈。我曾在二院外边的树林下面，看到一些系里的学生追着他们的党总支书记进行批斗，群起而攻之，要他交代问题。我阻止过这种行为，可是谁能听进去呢？

张承先住在临湖轩，从临湖轩到校办公楼开会，不过一百多米，他都要坐汽车去，官气十足，比陆平的派头还大得多。另外，工作组接管了学校的大权以后，他们也需要控制学校的局面，把学校的批判斗争控制在他们设想的范围内，要求学生听从他们的安排和指挥，使师生们感到又受到新的限制以至压制了。这样就给学生的印象很不好，觉得又来了一个官老爷，还是限制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既然陆平因为阻碍运动被赶下台了，学生们对张承先的举动由怀疑到反对，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随后，就发生了“6·18事件”：1966年6月18日上午，一批学生冲破工作组划定的界限，自发地起来批斗所谓的“牛鬼蛇神”，出现了乱斗的混乱局面。很快，工作组制止了这种乱斗的现象，并把“6·1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对当天参加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工作组不知道怎么会怀疑到我头上，以为我是6·18事件的后台，是幕后指挥者。我告诉工作组，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那一天我是在系办公室，没有到外面来。好在工作组追查这一事件的时候，的确没有发现我与此事有什么联系，这才作罢。

有人说，我曾经被任命为张承先工作组办公室主任。但是，我自己并不知此事，没有人通知过我就任，我也没有参与过工作组的工作，更不知道我这“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里。

#### ◇ 毛泽东对6·18事件的态度

《王力反思录》第三版第397～398页写道：

北大六一八简报是刘少奇批的，康生、陈伯达都画了圈。简报说对“反革命事件”要镇压，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国仿行。那时上海电话还没来，康生、陈伯达也在简报上画了圈。六一八事件的经过大体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组，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经被坏人利用。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见北大文革简报第九号。少奇同志批了：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作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办法处理。据说当时有侮辱妇女的行为。我们没听说。有的书没有说简报认为北大事件是反革命，只说毛主席认为不是反革命，是革命事件，这是春秋笔法。这一段经过是在上海来电话以前。事件发生在六月十八日，上海电话是六月下旬。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毛主席认为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他当时还不知有少奇同志批语。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会开会之前，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来源于少奇同志的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画了圈。他在文革小组里说：“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文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毛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他马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当时不但骂刘少奇，还骂了康生。因为张春桥告了康生的状，说康生把简报揣在怀里很久没有拿出来。毛主席说，要康生这种人有什么用处？我想，康生不拿出来，一方面有个人顾虑，因为自己也画了圈；另方面据我观察，他也顾虑到是否要告刘少奇一状的问题。他当时对刘邓还是尊重的。他常讲，他自己在白区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路线。少奇同志是正确的。总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大字报和换接班人的决心来源于此。

#### ◇ 关于1966年7·25、7·26大会

1966年的7月25日和26日，在北大东操场，召开两次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26日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7·25大会的主持人是江青，一些北大学生上台发言，批评工作组。台下的同学还递了许多条子，包起来有一大包。江青次日晚说把这些条子都拿回去给毛主席看了。7·25大会因下大雨没有开完，次日晚继续召开。7月26日晚的大会由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似乎全来了。这次大会学生发言少，主要中央首长讲话。为了研究历史的方便，我将部分讲话附后（说明：找不到全部了）。

#### ▲ 康生在北大全校辩论大会上的讲话（1966·7·25）

江青同志讲了，毛主席叫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这不是谦虚，因为毛主席说过了，一切革命的正确领导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文化大革命靠谁做呢？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靠我们，首先是靠你们，同学们、教员们大家一起来做。因此我们想在你们这个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听说：同志们在若干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健康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才能更加清楚。比如“六·一八”，有人说“六·一八”是革命的，有人说是反革命的，还有人说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要也没派。你们的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从六月一日到现在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种意见，有的讲是好的，有的讲有一些错误，有的讲有路线性的错误，有的讲是路线错误。敞开思想讲，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不要有顾虑。有的讲工作组在这儿好，有的讲工作组不在这里的好。文化革命是靠你们来搞呢？还是靠工作组包办代替？文化革命怎么做法？陆平、彭珮云怎么斗？翦伯赞、冯定怎么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你们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我们，也不是工作组。这正是毛主席首先叫我告诉你们的重要任务。我的话不多讲，我们下车伊始，不能哇啦哇啦地讲，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的报告四个多钟头吗？你们说讲话也要精兵简政吆！我就讲到这里。

#### ▲ 陈伯达、康生在北京大学东操场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6·7·26）

##### △ 陈伯达的讲话：

今天在这个辩论会上听了各种不同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

对待工作组的态度问题，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在工作组这个问题上，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问题上，争论得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我们赞同许多同学们的意见，撤销这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一个障碍同志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我们走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道上，要撤掉这个障碍物。我们有些同学为工作组辩护，为张承先辩护，为张承先擦粉擦胭脂，除了别有用心的不说，在同学中有一种迷信，对工作组迷信，好像没有工作组你们就不能革命，认为有了工作组才能革命。实际上这个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我们建议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很多同志，很多人，受了一种

旧社会的影响，受了旧社会习惯势力，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革命就要工作组，好像没有工作组就不能革命了。你们就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对待工作组问题上，重复毛主席经常说的话，破除迷信，破除习惯势力，那怎么办呢？不是变成无组织、无政府了吗？你们是不是觉得没有秩序了？你们可以不可以自己革命呢？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雄心壮志呢？任何革命都不能包办代替，都不能用别人、外力包办代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我们脑子里还存在的残余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命，正如毛主席说的，这个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脑子，要革这个资产阶级的灵魂，革一切剥削阶级的灵魂。我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商量了一下，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新问题，新事物。这就是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有很多地方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样一些组织形式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由群众起来革命。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北大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些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些小组、委员会、代表会议的代表都不能由谁指定、都由群众选举。应当在群众中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可以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匆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嘛！大家来个无记名投票选举。我同意这种方法，这些成员都是你们的勤务员，要为大家服务的，不是骑在大家头上的，这样子，你们看，有没有把握把你们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相信你们是能搞好的！你们在选举中要注意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些成员，代表选出来以后，是不是一辈子当下去呢？不是的，今天发现他不称职，就可以随时撤换他，重新选举别人代替他。这个建议你们可以讨论。这个建议假如你们赞同的话，还有些具体问题，如档案资料、电台、要害部门、民兵、武装，现在掌握这些东西的人暂不要乱动，将来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制定这方面的制度，没有变动以前要负责到底，同时接受群众监督，其中有些打问号的人，可以提出让委员们考虑。成立委员会后，是不是你们就没有饭吃了？要学会管理生活，现在还有些管理你们伙食的，行政事务工作的，他们还是不动，希望他们做好工作，比以前要做得更好，将来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生活管理委员会，或者小组，他们不是代替，而是进行监督。我们这些只是建议，第一是向北京市委建议，第二是向你们。在这以后，你们对工作组有不同看法，还可以继续辩论。我们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了？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是不是象有些同学递的条子说的那样，没有执行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呢？（众答：不是！）关于“六·一八”还可以继续争论，那天来我说过：有人说“六·一八”是反革命的事件，我说是错误的，应该说，“六·一八”是群众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学说得对。党的领导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这是很重要的。党的领导怎样代表呢？就是党中央、毛主席。同学们说“六·一八”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领导的精神，是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群众起来斗牛鬼蛇神，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妥当的。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要我讲的话就说完了，很对不起，我不会说普通话。

△ 康生的讲话：

同志们，昨天我提出了三个问题，请同志们讨论，听取同学们的意见。第一个问题，“六·一八”事件，同志们怎样看法，我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另一个问题，请同学们考虑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到底怎么样？是要还是不要？这个问题我们也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表示了我们的建议。第三个问题，北大今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我们表示了建议。我完全赞同我们小组长的建议，不晓得同志们怎么样？

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建议，再重复一次，是个建议，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强加于你们，一切赞同不赞同的权力不归我们，而归于你们大家。

昨天，我们问过，也调查过，在文化革命中谁是主人呢？我听到两种意见，大多数师生是主人，也就是说，你们是主人；也有人说工作组是主人。

今天，有很多条子，说很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鼓掌，似乎我们一鼓掌，问题就定了，不是的，同志们，问题在你们，鼓掌不鼓掌要看你们，对不对要通过你们的头脑来考虑，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态度，这样很危险，要是我们鼓错了，那你们不是也错了？

我认为，张承先这个工作组最大的错误有两个：

第一个，五十多天以来，不是真正教同志们，使同志们认识到北大文化革命要靠北大革命师生来搞，他们没有进行教育，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错误，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第二个，五十多天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在工作组包办代替下进行工作的，不是真正的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刚才有个叫李杨杨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像我们北大离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像张承先是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你们不是天天唱国际歌吗？想想国际歌是怎么说的？依靠自己救自己，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依靠自己救自己，而要依靠别人呢？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是口头讲的，要靠行动来体现的，张承先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实际上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无数的事实，北大运动中的事实也证明，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那就能达到目的，达到胜利。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主席指示，就会犯错误，遭受挫折，遭到失败。

因此，同志们，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都会前进，都会胜利。共产党好在哪里？好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共产党员也好，团员也好，干部子弟也好，工农子弟也好，真正好是在群众之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离开群众，那就不是好的，就没有我们的一切。

斯大林讲过，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毛主席讲，群众是我们的主人。我希望党员、团员、革命干部子弟、工农子弟必须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掌握住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革命委员会，有的同志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还有人讲，张承先走了，不就是没有党的领导了吗？陆平不是垮台了吗？那怎么办呢？你们北大是独立王国呢？还是不受新市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呢？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是要真正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不执行，就是张承先在这里，也是没有党的领导。

再次地重复一下，这是一个建议，有不同意见，大家都还可以讲，还可以千言万语都讲，你们可以万花齐放，真理越辩越清楚，经过辩论达到万众一心，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的万众一心。

同志们，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也好，你们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建议，请你们读一读九评，毛主席讲的接班人五条。这五条，它不仅

是接班人的五条，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那时讲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毛泽东思想；那里讲到，要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服务，而不是自私自利为资产阶级服务；那里讲到，要团结大多数的人，甚至是反对过自己并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里讲，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那里讲，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一些，是你们的革命工作中的最重要的指针。我相信，你们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新方针的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彻底胜利。关键在于你们自己把真正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北大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了解，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珏云的材料是靠你们揭发呢？还是靠张承先几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么？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斗翦伯赞、斗冯定。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看得多呢？

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么呢？整个计划想过没有？那下一步就要搞教育改革，学制怎么样？课程怎么样？教材怎么样？这些东西都要靠你们了，是不是我们随便说呢？不敢。五七年反右时，我的小子他们中文系自己写出文学史，轰轰烈烈，当然这里面有缺点，但不比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写得坏，而且比他们写得好！今天的教改要靠你们，要三结合，象五八年做过的那样，学生、教师、党的领导三结合，就比过去做得更好！

把整个东西看一看，斗黑帮，斗权威，搞教改，张承先办得了办不了？主要是靠你们。

我相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一次文化大革命。

▲ 关于江青的讲话，没有找到单独的文章记载。物理系60级学生曹凤杰在他的博客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转抄如下：

江青说，这些年在文艺界做了些工作，受了许多气，得了一身病，还得了肿瘤，弄得浑身没劲，上个楼梯出一身汗。她接着说：有人把阶级斗争搞到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里来了。我们有个儿子，他从小跟着岸英流浪街头，岸英牺牲对他打击很大，精神受了刺激，长年住在疗养院里。有位女护士出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对他照顾得很好，并表示愿意终身不嫁，照顾他一辈子。突然有一天，张文秋带着女儿少华来到疗养院，赶跑那个护士，强行宣布少华与岸青结婚。此后张少华到处扬言她是主席的儿媳妇儿。张文秋的大女儿刘思齐是岸英的爱人，岸英牺牲后，主席说我们是新社会，不搞三从四德，从一而终那一套，劝思齐重新建立了家庭。张文秋不甘心与主席断了这门亲家关系，便带她二女儿来疗养院抢亲。张文秋因此被中央组织部通报全国批评。她是政治骗子。江青停顿了一下，运了口气，扯着嗓子喊道：“同一学一们一，这样的儿媳妇我们能承认吗？我们坚决不一承一认！”……

接着江青又讲了第三件事。她说：“我的女儿李讷是北大历史系学生，已经毕业了。六四年他们去顺义县搞四清。北大有两个姓郝的，一个叫郝克明，另一个叫郝斌，他俩分别是校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历史系一教研室书记。四清时分别担任分团领导和工作队队长，是李讷的顶头上司。进村后，李讷和他的队长发生了意见分歧。郝队长起用的那个会计，李讷认为他有四不清问题，不能重用。队长不采纳她的意见。队里有位男青年教师，同意李讷观点，两人接触多了些。队长硬说他们在搞对象，违犯了四清工作守则。李讷不服，一气之下，跑回了家。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要求是严格的，从不姑息迁就，立即叫她回工作队，向他们陪礼道歉，可是他们却不见。”说到这，江青又一次扯着嗓子大叫：“同一学一们一哪，你们说，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啊？”几乎全场一起喊：“国一民一党！”她接着说：“就这样两个人，竟成了校系文革负责人。请问，工作组用的是什么人，执行的是什么组织路线？”

我在现场听到江青讲她家里的事情，感到奇怪，象儿媳妇这样的事，能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后来，张少华和郝斌都受到冲击。

◇ 江青的讲话让我有些迷惑

这么严肃的大会，全北大上万人参加，江青还是那样的身份，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文化革命运动怎么搞，朝哪里发展，你倒是讲出些水平来啊！没有想到，她在会上婆婆妈妈，讲了很多她的家务事，讲她的儿媳妇张少华（韶华）怎么怎么不好，还讲到她的亲家、张少华的母亲怎么怎么不好——这样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讲这些家庭琐事干什么！

当年在前方，听说毛主席在延安和一个电影演员结婚，大家心里就嘀嘀咕咕的，党组织专门发了通知，不许议论这件事，这才把大家的嘴给堵上了。在延安，我又听说江青对警卫员，对照顾她的“小鬼”都不怎么好，颐指气使，随意斥责。在北大听她胡扯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就想，有多少重要的事情你不讲，关于运动怎么发展，你也不讲，你到北大是干什么来了？！这样，首先是从情绪上，我对江青就有点看法。

本来，在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张少华和她的妹妹来看过我，她们都是北大的学生，我们谈过话。我也看了她们带来的毛主席和她们姐妹合影的许多照片。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她们姐妹俩还是北大学生，在感情上我对她们是比较亲近的。不管江青再怎么讲，我对她们的看法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江青在会上讲她们的坏话，对于年轻幼稚的学生是很有影响力的，学生们以为张少华姐妹俩真是坏人，要揪她们俩。大会还没有结束，学生们就开始要揪张少华和她的妹妹了。江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她点名批判，谁当得起？张少华姐妹两个就从北大跑掉了。跑就跑吧，我没有叫学生去抓她们，没有必要去抓她们。江青说她们是坏人，再怎么坏，也就是两个学生，还能坏到哪里去？江青怎么说，那是她的事，再怎么闹，是她们的家务事，没什么意思。

后来，大约是在当年的秋冬，她们在逃亡中写了一个条子给我，是叫她们的同学转交给我的，内容是说想回学校，是否可以，同时说她们跑到外边，生活处境艰难，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当时我不同意她们回学校——北大的中央干部子弟那么多，运动开始以后，他们参加运动也很活跃，但后来他们的父母也被批斗，他们自己在群众中就受到歧视，陆续成为学校的纠纷人物。当时在校的那些高级干部子弟，我都想让他们离开，免得出什么问题。她们现在回来干什么？生活困难，我可以积极想办法。可是，我无法同她们取得联系。替她们送条子的两个学生，急匆匆地把那个条子塞给我就走开了。条子上说，她们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回信可以塞到那个地方的门下面。这样做我认为不安全，我怕被别人捡走了。可是，送信的学生已经走掉，没有办法找她们联系了。

但我还是想帮助她们。找不到她们，无法直接资助她们，我就把这件事向谢富治讲了，要求谢富治想办法帮助她们解决生活问题。谢富治是公安部长，他要是想找到张少华姐妹，应该是很容易的。可是，谢富治不理睬这个事，他说他管不了，让我找周总理。当时我想，可能他怕江青。我说，我要见总理，得有机会，有场合，不能及时地解决她们的困难。谢富治就说，那你给总理写个信吧，我转交给他。我当即就给周总理写了个便条装在信封里，请谢富治转交。我推测，这样的事情，无论怎么说，谢富治不会从中作梗，张少华毕竟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汇报一下她们的近况，转达她们要求帮助的请求，这样的资讯应该能够传到周总理那里。后来听说周总理也给他们解决了生活的问题。

可是，文革结束以后，张少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字，一方面说周恩来总理曾经在危难中帮助了她们姐妹，一方面却说是我让学生去抓他们姐妹俩，这绝对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抓她们呢？从我的心情上讲，我想帮助她们的，只是我当时没有那么大能力，否则我为什么要对谢富治讲，还给周总理写报告？张少华指责我，我可以理解，她不知道内情，不知道我给总理写过报告。

□ 摘自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出版

~~~~~

## 【往事非烟】

### 五十年前我见证的人大血腥武斗

• 陆伟国 •

1968年3月29日，聂元梓的“新北大”从31楼开始武力驱赶对立面同学，拉开了北京高校群众组织之间武斗的大幕。

面对局势的混乱、武斗重新抬头，高层反而显得束手无策、举措失当。4月29日各校群众组织头头的学习班搞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令人不解的是，市革委和卫戍区还干脆来了个“四不”方针，“不管，不急，不压，不怕乱”。5月7日，市革委主任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议上就说：“反掉无产阶级的派性，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给我们纠正啦。”这使对立各派以为放手一搏、重整旗鼓的机会到了。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此时，人民大学校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进校时敲锣打鼓大不一样，5月10日，驻校“军训团”面对失控局面无能为力，突然撤走。应该说，这是高层的一个重大失策。两派之间顿时失去一个第三方的制衡因素，都急于要抢夺“制高点”，扩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儿讲的“制高点”，不只是个地理概念。于是，就不顾一切地发生了直接碰撞。再加上江青又曾一再发出“要文攻武卫”的号召，于是最血腥的面对面杀人的武斗开始了。

当天，对方“新人大公社”占据了林园9楼。那是栋教工家属楼。有11户“三红”教师的家被抄和赶走。

#### ◇ 第一场大武斗

人民大学第一场大的武斗，就是发生在这第二天，5月11日，由“三红”攻打红楼。

此红楼，非贾宝玉的“红楼”，而是人大校门口西北侧的单身职工楼。

打它干什么呢？

“人大三红”在学校东南角的控制范围主要是东风楼的三座楼，和留学生楼、教学办公楼、新教学大楼（这些都是当时的叫法，新教学大楼现在叫公共教学二楼），基本上是一字排开，没有纵深，无法形成防御体系。于是，要攻占东风楼北面隔着一块空地的红楼。攻击是傍晚开始的，用的是砖块木棒。对方在楼内退至二楼抵抗，这一方也没有采取登梯强攻，双方形成对峙。



晚上，灯光大亮。双方的群众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线后面，高声呐喊助威。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喊声中，本方人员一次次地向红楼冲锋，楼上则雨点似地抛下事先准备好的砖块杂物。每当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哗哗”从半空堕落，嗷嗷的呐喊声就爆发出一阵阵的高潮。一些同学则“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捡起地上的砖块往上扔，想为攻势添把力。

但要攻下一座楼谈何容易。对方楼上的人员，因无路可退，抵抗也很顽强。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为此往返数次。即使有冲进楼内的，也很难坚持，又跑了出来。一个个伤员，被扶了回来。从红楼到“三红”总部大楼的几百米路上，布满了点点血滴，接连不断，可见现场攻防之激烈。这种情况，真要强攻，伤亡必然很大。从现场来看，双方的指挥还算比较克制。可能是对方考虑到他们控制的区域范围较大也较为分散，难以分兵把守，容易被分割包围。最后，双方停火，攻方暂时后退，让守方撤出，再由“三红”接管。“三红”由一条单薄的防线，形成了有几个楼可以互为犄角、相互依托的“防区”。

这整个过程，我都在现场，但没有冲上去，也没扔石头。我的体质不行，扔块石头不见得比女同学远，就算是扔，恐怕连墙也够不着，别上去丢人现眼了。

#### ◇ 夜袭兵工厂

武斗不可能带来“安全”，既然有了开端，渐渐地也就不断发生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防备对方的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宿舍楼，都是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等堵死。二楼的窗户只留半扇，另半扇就用板挡上钉死。楼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个人勉强侧身而过，这样大大增加对方可能的攻楼的难度。

为了便于自卫防身，防备对方冲进来突袭抓人，我们男生几乎每人都配备了一根长矛。平常下楼出去，哪怕是上食堂打饭，都要随身扛着。那长矛，是把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截成两米长一根，一头磨成极锐利的尖刺。据说那东西比刺刀还好使，刺中对方后，血从管内喷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进人体后因有血肉的压迫，有时很难拔出，甚至出现卷曲。

这些长矛和其它一些简易武器，上哪儿去制作？学校的西面有个1965年初刚建成的校办工厂，那是一个小型机械厂，里面有一些机床、钢条，被对方所占据，成了对方制作刀枪的“兵工厂”。这可是涉及到双方力量对比的重大因素，不可不“为之一战”。

5月15日，“三红”这边向校办工厂发起突然袭击。那次行动是在晚上，所以叫“夜袭兵工厂”。原本是想以极短时间迅速抢夺一些钢条、简单工具过来，尽量不发生对抗。之所以放在晚上，也是以为对方的守卫人员会少一些，可能造成的后果会小一些。结果，真的冲进去时，还是与厂里对方的留守人员发生冲突，引来了对方人员的增援。双方在厂门口和围墙处，用铁棍木棒大打了一番。前后约四十分钟，而且还是发生了惨痛的伤亡事件。对方中文系的王锡中同学不幸身亡。他是死在房顶上，很可能是受伤后，躲避到屋顶，而永远地倒在那里。

我们是天亮后知道这事的。事后还听说对方有位工人师傅，面对长矛的尖刺还慌不择言、跪地哀求：“我家还有三个老婆、一个孩子哪，放过我吧。”那一阵还把这当作笑料来传，其实那也是几多辛酸泪啊。

#### ◇ 捣毁野猪林

武斗的车轮越转越快。

防备在全方位地进行。连我们的宿舍，也有了张不知从哪儿来的弓箭，说是可以在对方攻楼时派上用场。我试了一下，要拉开弓还真得费点劲。朝着门上，拉了还不到一半就放手，“砰”的一声，真厉害，那箭头把门板都打穿了。不过，我知道，真要到那时候，还没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倒了。

宿舍里有了长矛，还出了个小意外。没等对方来，就差点伤了自己人。一天，在我们宿舍里，有个同学闲极无聊，想试试那东西管不管用，拿起来就往墙上捅了上去。谁知，那墙不是砖墙，而是两层带缝的木条，中间是空的，有一块砖样子的间隔，外面用泥巴和石灰糊上。长矛捅上去，那墙哪里经得起，“哗”的一声，掉下一大面泥巴、石灰，就穿了过去。引得旁边宿舍的那位同学生气了，过来就把我们门上面气窗的玻璃给砸了。我们知道有点理亏，悄悄的，都没出声。

“三红”除了在东南面有一个控制区域，在西面还有南五楼、五处的一片，两个区域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可大路的北侧有片不大的松树林，林中有个体育用品房，常被对方当作埋伏武装人员之处，用来偷袭伤害这一边过路的人。于是这一边就要铲除这一隐患。

5月17日，那天下午，先是手持棍棒长矛的“武斗队”冲入树林，把那小板房彻底砸烂了。对方也没有人在那儿。里面的体育用品，就往回搬到教学大楼里堆起来。搬东西的事，没有人提前通知，也没有人组织指挥，大家见状都纷纷主动跑来搬。武斗队排成一排，在外面警戒保护。大道上，上百人在来回奔跑，抱的、扛的、提的，忙得不亦乐乎。整个过程，动作很迅速。我正好碰上，也去一手抱一个球，一次拿两个，急急忙忙地跑了两趟。心里还在想，这也是在保护国家财产？

因为有这片松树林，所以这次动作，称之为“捣毁野猪林”。由于双方没有发生直接冲突，这一天在现场的同学们都是兴冲冲的。这场没有对手的行动，就像是一堂课外活动。

但事情又很快就到了最血淋淋的一幕。

#### ◇ 专职武斗队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武斗，各群众组织都成立了专门的武斗队，装备也在不断升级。两派斗争到了真正意义上你死我活的地步。

“三红”也组织了一支四五十人的专门“武斗队”。这时的“武斗队员”，装备已经非同一般。每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帽沿下面连着铁丝编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铁皮剪成的铠甲，铁皮下都垫着书本。那时的铁皮有的是，到处都是毛的语录牌，正好用上，剪成一片片的铠甲。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个古代的武士，浑身上下冷冷的，连从铁丝罩后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

他们这支队伍的成员，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级的同学，以转业军人居多，“战斗力”比较强。有次，他们就在我窗外的楼下操练，双双对刺，“哈，哈”地喊着刺杀声。尽管是全身铠甲，脸前有铁丝罩保护。不料，还是有人当场受伤，被对面的尖刺穿过面罩上的铁丝网，打掉了门牙，嘴巴鲜血直流，多危险哪！要是再捅进去一点点呢？到真的拼杀时，那会是什么结果啊？不过，他们的军事素质看来很好。出了这样的事，其他人就像没发生一样，依旧

在原地双双对刺。只是领队的过来看一下，也没多说什么，叫他下去休息。那位受伤的同学，也很坚强，连头盔也没摘。那时的青年学生，都被“革命”熏陶到了什么样子。

出于好奇，我也曾穿上这身装束试试。感觉太异样了。重，还是其次。就是太别扭，太拘束，手脚无法施展，浑身上下都动弹不了。做什么动作都完全变形，力度和方向没法把握。尽管曾有过多次的军训和体育课，作为那时的大学生，对刺杀动作已很熟练，但这时好像我已经不是我，完全是被机器支配着，就像一根拽在别人手里、任由他人挥动的棍棒。

透过面前的铁丝罩向外看去，别的人，也就都像是一个个要消灭、要杀戮的对象，是一个个要啖其肉、噬其血的猎物。头脑在发热，热血在翻腾，浑身在膨胀，手脚几乎都不听指挥了，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杀人，杀人”的字样，就想要刺杀出去。我从心里感到可怕，不只是怕真要上了武斗场，这身装束将成为别人刺杀的对象。更怕的是，在这身装束下，人已经被彻底地扭曲了，已经不再是有正常人性的人，而是一只杀人与被杀的野兽。“革命”的意义，“造反”的意义，此时都露出了本意。

血腥之剑一旦拔出，就像狂暴的野兽横冲直撞，想挡也挡不住、想停也停不下了，局面很快就失去控制。离“捣毁野猪林”仅仅过了几天，1968年5月22日，一场空前的血腥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

暴力之火是不能随便玩的，一点小小的无意的火花，说不准就能酿成无法扑灭的烈焰。这场武斗，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自己控制区的边缘挖壕沟、拉铁丝网、修筑工事。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像是朝鲜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到出动“武斗队”拼杀。

那天，下午，当时，好像一切都很平常，我在楼下，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跟往常一样。突然，有同学从大路边走过来，神色紧张地对我们在外面的几个叫着：“西面打起来了！西面打起来了！你们这儿还像没事一样，不知道啊？”“怎么啦？”我们问。“打起来了！都打起来了！”他使劲地嚷着，我们却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时，“哗啦”一声，“武斗队”从总部大楼出发了。我们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

所以，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我们想跟着去，被队伍后面的人制止了。我想也是，我们跟着去，只能给他们添麻烦、增加负担，所以没有坚持。

#### ◇ 喋血大操场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当时的新图书馆，是“新人大”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叫图书馆东馆）。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前后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听说，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途中劫持。随车的，还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同学，听说是个教授的女儿，一身黑衣，手持一把长剑，真称得上是英姿飒爽。

这一夜，开始是异常的寂静，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到半夜时分，突然，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国际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我们一听，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个个都面面相觑。后半夜，传来话说，“有你们班的一个”，我们大惊。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叫陈江，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我们还都抱着希望，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总觉得不会是他，但愿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得到了确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现好，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他平常很谨慎、也很到位，有什么事情，既不能冲在前面，也不能落在后面。虽然我们班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对这场“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认真。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讲的这个原因，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现，竟然也出现在武斗场上，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尽管满心的不愿。

#### ◇ 痛哉！陈荣祖

几十年后，我能慢慢地复原当时的现场情况。那天的情况是，“新人大”一方对武斗的准备不充分，装备、训练、指挥和应急方案均不到位。第一线的“主力部队”交锋几下，很快就顶不住，又匆忙动员二线队员上去。而二线队员不但没有防护服，也没有像样点的武器，就是拿着木棒铁棍之类，有的甚至拿着食堂的扫帚、拖把就跑过来。我们班的李原好和陈荣祖同学拿的就是根木棍。而“三红”这边提前有所准备，在装备、训练、气势各方面均优于对方。双方在实力上，明显不在一个档次。

由于“新人大”这边一线人员顶不住回撤过快，把本来在后面的非主力二线队员反而闪在了前面。当“三红”的武斗队冲到这边二线队员面前时，现场发生混乱，指挥失灵。有的见势不妙就往后跑，有的竟然站那儿不知所措，有的心里还想着“坚强勇敢”的人还在往前冲。陈荣祖同学没有很快后撤，而是拿着木棍还想抵挡一下，就被无情地刺上了。只几分钟的时间，地上就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伤员。等“三红”稍有后退，这边的人大喊：“刺死人啦！快救人啊！”人们不顾一切地赶紧上去抢救。我们的班长李原好冲过来一看，发现自己班的陈荣祖也躺在了那儿，满脸满身都是血，胸口的血水像泉水一样往外涌。同学们七手八脚把受伤倒地的人往后抬到路上。校医赶过来看的时候，说已经不行了，不用送医院了。等到了积水潭医院，医生确诊已经去世。这时，李原好同学抱着陈荣祖的遗体失声痛哭、满脸是泪。所有在场的人，都哭成一片。谁都没想到，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

在医院的太平间里，陈荣祖躺在那儿，满脸的血污，紧闭的双眼，那毫无血色、苍白得吓人的脸，那浸透了血渍、被刺破了的衣服，使见过他遗容的同学至今都闭目难忘。也谈不上整容，只是擦去脸上的血块。在我们的班长给他收殓的时候，连件替换的衣服都没有。他的衣物还在被“三红”占据的东风三楼，不敢过去拿。还是历史系的一个老师给了件稍微好

一点的，给他穿上。临离开这个世界，都没能穿上自己的衣服。他的血衣，听说被我们班的一位同学保存了很长的时间，直到那位同学自己去世。

更痛心的是，他家在苏北农村，景况十分贫寒。而且很早就结婚了，已经有了个一岁多的孩子。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他妻子拖着孩子赶来北京，已是和自己至亲的亲人阴阳相隔。这位不幸的妻子来到城内分部的那夜，在住宿的楼里，一个门、一个门地拍打着，满楼道呼喊着她丈夫的名字，呼天呛地，悲痛欲绝，寻找着她的丈夫，寻找她生命的全部依靠。她，一个农村妇女，听不懂别人劝她的普通话，别人也听不懂她满心要说的苏北土话。整整一夜，那整个楼就一直回响着这凄厉悲呛的声音。

第二天，到了积水潭医院，见到已经僵硬了的丈夫，她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撕心裂肺地哭叫着，翻开丈夫的衣服，颤抖地抚摸着他丈夫身上累累的伤痕，几次昏死过去。见者也无不落泪。

事后，因为是群众组织，没有经济能力，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在陈荣祖妻儿快要离开时，李原好冒险回东风楼拿回了陈荣祖的遗物。最后，我们班的李原好、王松岷、朱婉珍、米受光等同学去北京站为陈荣祖妻儿送行。当他们把陈荣祖的骨灰盒和遗物交给陈荣祖妻儿时，他的妻子和孩子跪地接过，磕头嚎啕大哭。几个同学把她扶起，也都哭成一团。车开了，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他们都在牵挂着这对孤儿寡母将要踏上怎样艰难的人生之路。当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每次修改看到这段文字，依然忍不住鼻子酸楚、泪水盈眶。

（这一节文字在出版的书稿中没有，他妻子来校时住在城内分部，我们在西郊的另一方当时不知道。在本书出版后，我的班长联系上我，告诉了这些事。陈荣祖同学的血衣，当时被田永祯同学保存着。他说要等陈荣祖的儿子长大后，亲手交给他儿子。不幸的是，田永祯同学也已去世。前不久，我还在试图寻找陈荣祖血衣的下落，但未有结果。）

在这一边的我，虽然不能为他送行，几十年来，他却始终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给每个班讲课，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都要讲这件事，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九十年代的一天，我讲完后，下课时，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对我说：“老师，你讲的，就是我的叔叔。”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孩子已长大成人，还是当地粮食部门的一名基层干部。如果没有改名的话，他孩子叫陈东林，现在应该有五十几了。

◇ 哭泣吧，苍天

“5·22”事件，是北京高校唯一一次面对面拼杀、造成重大伤亡的武斗事件。在这次武斗中，尤其最不应该、最令人痛惜的是，这三位死者中，竟然有一位是女同学，农业经济系的廖金妹（还有一位也是农经系的杨大志同学）。她是作为卫生员，真的是奋不顾身地上去抢救受伤倒地的同学，却也被刺杀了，被活生生地刺杀了，永远地倒在自己母校的操场上。她是我们班一位同学的老乡，还来过我们宿舍几次，能记起她的模样。我不是现场目击者。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些带血的长矛是怎么刺进一个倒在地上的女孩子，在她单薄而柔弱的身躯上，拔出又刺进，拔出又刺进！

还都是同窗手足啊！

哭泣吧，苍天！苍天！！苍天！！

当然，在这腥风血雨中，也难得有一些人性的闪光。当年参与这场武斗的我方的李同学前不久告诉我，当他手持武器踏上这操场时，看到这场面，既要保护己方的同学，又看到对方倒在地上的同学，心里是异常的复杂。在他往前冲的时候，对方一位同学往后跑，因慌不择路而跌倒在地，他还上去跟他说，快起来，赶紧跑吧。

或许有人会说，要是大家都这样就好了。但是在一个泯灭人性的大环境里，不能指望这样。暴虐的滔天洪水，早已吞没了一切。被践踏得七零八落的理性是挡不住这些的，最多不过是狂涛中一些稍纵即逝的泡沫而已。

惨剧过后，“新人大公社”隆重地召开了一个追悼大会。会上群情激愤，高唱着国际歌和毛主席语录歌。王锡中同学的父亲作为死难者家属代表在大会发言：儿子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光荣的；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现在想来，他们的血还真不应该白流。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带给我们今天的人们有哪些思考呢？今天的我们还认真地想过这些没有呢？

〔作者简介：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

□ 来源：作者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

~~~~~

#### 【亲历者言】

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选载之二）

• 陈楚三 •

（上接 z k 1 8 0 4 a ）

### 第三节 简评“三种人”

我应当感谢孔丹，不但是因为他公布了陈云对他的信的批示，使我第一次看到陈云对我“原汁原味”严厉警告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孔丹公布的这一重要文件促使我重新思考“三种人”问题。

所谓“三种人”，据说是陈云发明的，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也有人说是邓小平发明的。

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清理“三种人”的，可能是1982年12月30日发出的通知，通知从八个方面提出清查要求，但只有文革中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是具体而又明确划定的清查重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记录在案的问题，要同本人核对，错误严重的要进行处理。”同时对中学老红卫兵却网开一面：“虽然犯有错误但当时是未成年学生，不要再去追究，也不必记录在案。”（注5·3·1）

三部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及教育部）1983年4月23日的发文，则完全“赦免”了中学生：前述中央《通知》还只是限于“未成年”的中学生，而三部委《意见》却说“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不搞记录在案”，把已成年的中学高年级学生也包括在内。（注5·3·2）

但是1984年7月31日的中共中央文件中，仍坚持“未成年”，并且附加了不“记录在案”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年龄未满十八周岁的学生红卫兵中，有些人由于政治上无知，受‘左’的思想影响或受人指使犯了错误，包括‘破四旧’中群众性打人致死一类的严重问题，后来承认了错误，确有认识，现实表现好的，不作为问题提出。”（注5·3·3）从时间上看，这是在陈云对孔丹信的批示之后，很可能也是对三部委的文件遭到质疑的某种回应。然而，毕竟三部委是具体执行部门，在实际清理过程中，对中学“老红卫兵”仍然不管成年未成年，不管是否“承认了错误，确有认识”，全部一风吹。值得注意的是，该中央文件中竟然说，“‘破四旧’中群众性打人致死”“不作为问题提出”！既限定了时间段：“破四旧”，又限定了场景：“群众性打人致死”，这不正是1966年八月老红卫兵所大肆宣扬的“红色恐怖”吗？！看来，这个文件简直就是为老红卫兵“定制”的，就是露骨地包庇老红卫兵的血腥暴行不被追究。这个文件正是陈云对孔丹信批示的直接“成果”。

从文件看，所谓“记录在案”，首先是“归入本人档案”，更重要的是还要通知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实际上就是把你“入另册”了，“记录在案”的“光环”会在你头上悬挂一辈子。其次，“记录在案”和“三种人”有何关系？虽然文件中也说，“三种人”“不是政治帽子”，“也不是组织处分”，“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被记录在案的人同三种人等同起来”，但是如前节所述，象我这样虽然“记录在案”可是“没发现什么问题”的人，却被陈云归为“要特别警惕”一类，连本人和妻子的工作调动都受到影响，因此，实际上是一回事：“记录在案”的就是“犯‘三种人’错误”的；当然，依据“记录在案”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处理也有所不同，有一些会判刑。第三，中学红卫兵不搞“记录在案”，只对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搞“记录在案”；并且，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的保守派不在“记录在案”之列，只算造反派红卫兵的账。

按文件要求，记录在案的对象是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文件列举了七类“严重问题”，并特别指出“只要有上述问题，不论是哪一个组织的，都应记录在案”（注5·3·4）；按说，正确的理解应当是，高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固然要记录在案，而“有严重问题的人”，不管是造反组织还是保守组织，不管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都应记录在案”，这样才比较公平。涉及这七类“严重问题”特别是其中“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破坏公私财物”等问题的，老红卫兵中都大有人在，“都应记录在案”。但实际上，“有严重问题的人”，若是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组织就不予追究，“记录在案”的大棒只落在高校学生造反组织头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从单纯法律的角度，似乎挑不出文件的大毛病。对于“未成年人”，法律认为他们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不具备完全的辨别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如果犯罪则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这只是从量刑、处罚的角度，决不意味着对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可以不查不追究，可以一风吹。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等八种重大罪行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满16周岁的人犯任何罪都应负刑事责任；不查，怎么知道他犯什么罪，不查，怎么了解他犯罪的情节轻重？以“未成年人”为借口，要求对中学红卫兵的任何错误“不要再去追究”，就是不要查他们，就是对他们的问题都一风吹。实际上，当年老红卫兵的主要头头和骨干多数是高中学生，差不多都超过16周岁，其中许多超过18周岁，已是成年人，但也同样一风吹了。

为什么一风吹？文件中给出的“理由”是：中学红卫兵“由于政治上无知，受‘左’的思想影响或受人指使犯了错误”，孔丹的信也说是“‘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总之是由于“无知”，“受‘左’的思想影响或受人指使”。我看，“受‘左’的思想影响”是确实的，“无知”却有欲盖弥彰之嫌。就算中学红卫兵“年幼无知”，高中三年级和大学一年级只差一年，大一学生就“年长有知”吗？况且按孔丹信，老红卫兵包括大学一司，这就更令人费解：一司的那些大学生“年幼无知”，难道二司、三司的大学生就“年长有知”？

一风吹的真正原因在于，老红卫兵（包括大学一司）的这些头头和骨干是高干子女，他们的父母辈在文革后重新掌权了，不允许“追究”自己子女曾经的罪错。

文革初期的事实是，这些高干子女不是“无知”而是“先知”。他们“先知”党内高层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以，女一中和男四中的一些中学生（后来的“老红卫兵”）在1966年6月初就上书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清华，他们“先知”蒋南翔即将被抛出，才有刘涛等说蒋“反毛泽东思想”的6月4日大字报；“先知”工作组即将撤出，才有雷蓉王小平7月27日批工作组的大字报；“先知”刘少奇地位不保，才有贺鹏飞等8月19日的“三问王光美”大字报（注5·3·5）。真正“无知”的，不是高干子女，而是绝大多数没有背景的普通学生。

“老红卫兵”是不是造反派？他们自己说，不是：“‘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与造反派“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注5·3·6）。

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活动”是什么？过来人都知道，首先就是批判和斗争校长、老师；其次就是“破四旧”。

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描述了孔丹所在的北京四中批斗校长老师的活动：“8月4日，在四中校园爆发了第一次全校性的对教职员的大规模暴力性攻击。数十名教职员被抓出来‘斗争’，并在操场上绕圈子‘游街’。有人打他们，有人往他们身上泼墨汁。女校长杨滨浑身是墨，副校长刘铁岭的衬衫被撕碎。有的班主任也遭到学生的拳头。”不能不说，第二天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打死，甚至8月27日宽街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都被打死，是受了四中这个“榜样”的影响。一名四中当时的学生说：四中红卫兵还打死两个校外居民。仅在1966年8月，北京市西城区被红卫兵打死的中小学负责人就有八人。

孔丹的信和他的书中，都说“西纠”是保护老干部、反对过火行为，我不怀疑孔丹等人当年的这一善良愿望，但也必须指出这仅仅是少数人的愿望，而“西纠”做为一个整体的实际行动却是血腥和暴虐，这是不应粉饰、也粉饰不了的。仅举三例：“西纠”于8月25日成立，师大二附中红卫兵当天就打死该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等三人；三十八中红卫兵在8月28日三小时之内打死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黄瑞五一家五口；六中红卫兵自设监狱存在一百多天，数十人在那里被残酷毒打，三人被打死，其中一名本校高三学生仅仅因为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外出串联，回到北京第二天就被打死。（注5·3·7）六中、师大二附中和三十八中都是“西纠”的成员。正是“西纠”所“管辖”的西城区，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最多，而且死亡数字几乎相当于死亡数字居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另外三个区的总和！

王友琴书中列举了北京市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的273人，都有名有姓有单位，其中中小学84人，包括四中教职工三人；但其实远远不止此数目。书中指出，1978年“在为



一批教育工作者召开的平反会上，西城区的负责人说，在西城区，有276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我无法证实这个平反会，如果属实，则仅西城区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就超过王友琴书中所列全北京被迫害致死的人数。仅西城区就有这么多，全北京市该有多少？全国又该有多少？

再说“破四旧”。1958年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中确定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几天之内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8、9月期间，北京市被迫害致死1,722人，有33,695户被抄家。在“西纠”的第四号通令（所谓“黑六类”限期离京）发布后的四十天内，北京市有8.5万人被赶出京城（注5.3.8），他们有的还未出北京在车站就被打死，有的在途中被打死，也有许多回到原籍后被打死。这些，就是北京老红卫兵破四旧的“丰功伟绩”。

老红卫兵批斗校长老师和“破四旧”的这些“活动”，其中称得上“情节严重”、“后果严重”、“影响恶劣”的可以说有成千上万件，却无人被追究，无人被“记录在案”，不少“主要责任人”可能还堂而皇之地进入“第三梯队”，青云直上。

老红卫兵和大专院校学生造反派的“活动性质”有什么“根本不同”？在孔丹看来，老红卫兵仅仅是“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而大专院校学生造反派却“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注5.3.9）那末请问，中小学党支部是否“各级党委”之一？许多中小学的校长、党支部书记不也是“老干部”吗？例如北京101中校长王一知，1922年入党，当然是“老干部”；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1941年入党，也是“老干部”啊！照孔丹的逻辑，普通人、一般干部被打被抄甚至被打死，是“一般性错误”；而高级干部被打被炮轰，就大逆不道，“性质上根本不同”；说穿了，就是老百姓和一般干部都属于“贱民”，他们的生命不值钱。

此外，“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难道只是地富反坏吗？当然不是，老红卫兵认为，学校的“党委”（党支部）、校长、许多老师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都“被认为是‘阶级敌人’”，所以才要揪斗、才要打死方休！同样，当时被揪斗、打倒的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不是造反派自己）冠以“叛徒内奸工贼”、“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不也是“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并且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吗？周恩来总理不是几乎每次大会小会讲话都要点这些“阶级敌人”的名吗？绝大多数造反派不正是抱着“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信念，才“炮轰”、“揪斗”、“打倒”这些“阶级敌人”的吗？

因此，老红卫兵和以后大专院校中的学生造反派，矛头都是对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发生的，性质完全一样！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老红卫兵刑讯毒打他们的校长、老师以及所谓“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的疯狂程度和造成的严重后果，都要远远超过后来高等院校的学生造反派；在北京各高校，除了两派斗争中对于对立派人员的私刑拷打、以及各种名义的专案组对于被审查

人的刑讯逼供之外，我还未听说过在批斗会上或大庭广众面前把学校内的“专政对象”当场打死的惨剧，而这在老红卫兵几乎是“家常便饭”。

顺便指出，孔丹信中指責造反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孔丹不会不知道，“对老干部搞‘专案’”的，主要并不是造反派而是中共中央，并且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就是周总理；地方的“专案组”虽然由造反派出面组织，但大多数也是经中央专案组授权的，前面已经提到的“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就是典型例子；而所谓“群众专政”，首先在中学兴起，始作俑者不正是老红卫兵吗？前面提到的存在了一百多天的六中红卫兵自设监狱，以及第一章第六节所述101中的“专政队”、“劳改队”（各中学都有），不正是老红卫兵的“创造”吗？

在此不能不提到蒯大富。在林彪、江青的“两案”审判结束后的1983年，蒯大富也被提起公诉。如果起诉他打砸抢、挑起武斗、指挥打死打伤工宣队、刑讯逼供致死致伤多名干部教师学生等，这属于刑事犯罪，即使判刑再重，他也无话可说，罪有应得；但诉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蒯大富不服，在法庭上和检察官、法官进行了辩论。他说：“《刑法》第90条列明：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你能证明我有这种动机和行为吗？如果回到1966年，我那时才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他反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么？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么？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么？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是反革命？”（注5·3·10）

蒯大富不仅是在为自己辩护，他也是在为当年一心一意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号召、满怀激情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千千万万个造反派辩护，也是在为许许多多没有刑事犯罪、甚至“没发现什么问题”的“三种人”辩护。稍加修改，蒯大富对审判长的诘问也完全可以用来诘问孔丹：“您比我小三岁，1966年时您已经十九岁了而且上层消息灵通，您那时认为毛主席发动文革错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彭罗陆杨’么？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要篡党夺权么？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说我造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

我在给李志民的信中提到“八旗子弟”，他们在运动初期敢于造反，比一般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更“左”，更“革命”，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后，他们就逍遥了，不“革命”了。其实，这主要就是指老红卫兵。有人根据这一事实把他们称为“保爹保妈派”；我认为，“保爹保妈”并没有错，正因为对父母“有深厚的感情”，当父母受冲击、被打倒，才会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反过来说，若父母未受冲击，他们还会“继续革命”，继续造反。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曾在《解放军报》社造反，打倒了胡痴、赵易亚（注5·3·11）；陶铸（注5·3·12）的女儿陶斯亮，文革初期在二医大参加了造反组织《红纵》反对邱会作（注5·3·13）；毛主席的另一个女儿李敏，文革中在国防科委系统炮轰聂荣臻、火烧蔡顺礼，还要揪出刘华清（注5·3·14）；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头头，她亲自策划绑架了彭真，并且组织了揪斗彭罗陆杨大会。这四位“公主”所揪斗、打倒、炮轰、火烧、绑架的，不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么？能说她们的造反行为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么？陈毅（注5·3·15）之子陈小鲁回忆，文革初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

洁清阿姨在地下爬。”这些领导人子女造彭真反的行为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吗？我想，孔丹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一些老干部、老革命的子女——老红卫兵，揪斗、打倒、甚至打死被称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另一些老干部、老革命，这不能算是“造反”，不能说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而高校学生造反组织炮轰、揪斗这些“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紧跟林彪、‘四人帮’”，“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道理何在？孔丹为我们进行了“阶级分析”：老红卫兵“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大学生造反派呢？孔丹没有说他们的“出身”，只是说他们“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两者的“活动、组织及骨干”，“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联系到老红卫兵的“组织及其骨干”的实际，我不能不指出孔丹的看法有着明显的“血统论”的影响。如果我冒昧妄度一下，孔丹的言外之意应该是，大学生造反派“出身非红五类家庭”，“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刻骨仇恨”，“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完全相同”；但愿我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尽管孔丹的书中也写到他曾保护过出身不好的同学，但我不能肯定，如果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当时明确反对“西纠”，明确反对老红卫兵揪斗老师校长，孔丹还能那么宽容吗？还会保护他们吗？其实，大学生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至少对清华大学而言），其主体也“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也“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不同的是，老红卫兵是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己的子女为主体和骨干而已。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几乎所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造反派理所当然把矛头对准这些“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最后这些“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又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造反派的悲剧，也是我说“上党中央的当，受党中央的骗”的原因。

很多文章都指出，大专院校中的学生造反派，以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北京市学生“五大领袖”为标志，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时中共“九大”还没有召开。“九大”确定林彪为接班人，这是毛主席亲定、周总理极力拥戴的，并不是造反派把林彪推上去的；这时的“四人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担任政治局常委，也是毛主席亲定、周总理拥护的。说1968年就已退出文革舞台的高校学生造反派是为1969年当了“副统帅”的林彪、1973年前后形成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显然站不住脚。这些造反派（除了极少数例外）响应的是毛主席“造反有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号召，紧跟的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说他们“紧跟林彪、‘四人帮’”、“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是歪曲历史、莫须有的罪名。

至于“帮派思想严重”，“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更是可以“自由裁量”的罪名。林彪、江青除了卖力地宣扬“造反有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这些“发明权”属于毛主席本人的思想以外，他们自己的“创造”好象不多，林彪有被毛主席赞赏的“四个第一”，江青有“文攻武卫”（注5·3·16），实在不知道究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还包括了哪些内容？

中央文件中提到的“打砸抢”，具体表现有多种，其中“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破坏公私财物”，老红卫兵不但都有份儿，而且是始作俑

者，除了那些不满 14 周岁的学生外，都不应以什么“破四旧”、“群众性打人”为借口“不追究”，搞双重标准。

比老红卫兵的行为更为血腥、残酷的是，文革中有少数老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肆无忌惮地“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用“情节严重”已经不足以形容其暴虐的程度了！广西的韦国清（注 5·3·17），江苏的许世友（注 5·3·18），内蒙的滕海清（注 5·3·19）便是典型。

广西群众组织在文革初期分为反韦国清的“四二二派”和保韦国清的“联指”派，韦国清在一九六七年主持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后，与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注 5·3·20）和省军区负责人联手，对反对他的四二二派大肆报复，捏造了一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并诬陷它是四二二派的黑手，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 8·97 万人，其中 7·9 万多人并非武斗死亡，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打死和枪杀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此外，全区失踪 2 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 3 万多人。被有组织、有领导打死和枪杀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是“四二二派”或同情“四二二派”的。在 1968 年 8 月初，南宁市动用军队攻打四二二派据点，“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桂林地区发生了军队参与的 8·20 事件，事件中和事件后，也“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万多人”。甚至在武宣等近二十个县发生过惨无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蛮事件。（注 5·3·21）

许世友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曾被迫躲进大别山；当他担任了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后，就借清查“五一六”之机，对曾经反对或批判过他的群众、干部（包括一些老干部和军队干部）疯狂报复，造成江苏省空前未有的大冤案。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江苏省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达 26 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的 13 万多人），死伤 6000 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 2540 人）。（注 5·3·22）而南京市到 1972 年底，有 2 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逼死 300 多人。

清查“516”的扩大化，连周恩来直接管理的外交部也未能幸免，外交部原有人员 3000 多人，“在 1972 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 人……；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 31 人；因五一六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 80 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 170 多人；因五一六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 1408 人。”共计 1700 多人，竟然占当时外交部人员的一半以上！其中“犯严重错误”以上的 300 多人，达到全体人员的 10%！（注 5·3·23）

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冤案的罪魁祸首之一。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打死 16,222 人，致残 87,188 人。内蒙古党委后来在总结这场运动的报告中称：“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注 5·3·24）

类似的例子还有。这些老将军、老干部，曾经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过汗马功劳，但他们又为一己之私利，指挥和怂恿部属行凶杀戮、残害无辜，制造惊天冤案，这样的暴行不应当被无条件宽恕。然而，邓小平却说：“‘三种人’中间，……也有老干部，是少数。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做行吗？”（注 5·3·25）我们

不禁要问，韦国清、许世友、滕海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自己不赞成”而“违心”去做的吗？

因此，清理“三种人”，究其实质，是文革后重新上台的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干部进行反攻倒算的报复借口。反攻倒算和报复的特点，一是上层以林彪、“四人帮”为替罪羊；实际上文革的发起、文革的理论、文革的主要口号、文革的每一重大步骤，中央哪个人要保，哪个人要打倒，哪个人可以“烧而不焦”，都是毛泽东决定的，许多却硬安在林彪、“四人帮”头上。二是下层以造反派为替罪羊；把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所做的事，甚至毛主席批示、鼓励要做的事，炮轰省市、打倒走资派、造反夺权等等，统统说成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时还把老红卫兵的恶行硬栽到造反派头上。三是以“我”划线，仍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包括对一些老干部，不顺从、不“配合”的，或者在文革中被毛主席信用的，也照样请你走人，例如华国锋、陈锡联、吴德、吴忠、纪登奎、刘建勋（注5·3·26）等。甚至对反对过“我”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也不谅解。比如李敏，贵为毛主席的女儿，只因文革中炮轰过聂荣臻等人，文革后——当然更主要的是毛主席已经去世后——一直不给她分配工作，1977年5月起，她的工作证被其所在单位国防科委没收，国防科委大院不准她进门，连每月的粮票也无法领。万里（注5·3·27）说，“没有想到国防科委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黄克诚（注5·3·28）说，“要让李敏上班工作，恢复组织生活”（注5·3·29），但国防科委负责人张爱萍（注5·3·30）就是顶着不办。四是包庇自己子女的罪错并为他们“仕”途和“钱”途开辟道路；左手有选择地抓清理“三种人”，同时保护“老红卫兵”；右手抓“第三梯队”，培养提拔“自家人”以便垄断国家政治资源，并利用改革开放，向大中型国企派遣子弟兵以便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并趁机敛财。

用双重标准清理“三种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注释：

注5·3·1：见中发（1982）55号文：《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注5·3·2：见中组发（1983）6号文：《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及教育部党组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

注5·3·3：见中发（1984）17号文：《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

注5·3·4：同注5·3·2

注5·3·5：刘涛，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雷蓉，时任外贸部第一副部长雷任民之女；王小平，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之女；贺鹏飞，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之子。

注5·3·6：见《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注5·3·7：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电子版）

注5·3·8：见《当代中国的北京》，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5·3·9：见《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注5·3·10：引自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注5·3·11：文革中，李讷化名肖力被安排到《解放军报》工作，先后写大字报打倒胡痴、赵易亚，推翻了军报的两届领导班子。胡痴，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时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代理总编辑、新华社代社长。赵易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

注5·3·12：陶铸（1908·1·16—1969·11·30），文革初期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湖南祁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而死。

注5·3·13：邱会作（1914·4·15—2002·8·3），文革时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江西兴国人。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7年刑满。

注5·3·14：聂荣臻（1899·12·29—1992·5·14），文革时为国防科委主任。四川江津人。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蔡顺礼（1914·1·17—2009·7·22），文革时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江西吉安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委常务委员。刘华清（1916—2011·1·14），文革时为国防科委副主任。湖北大悟人。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注5·3·15：陈毅（1901·8·26—1972·1·6），文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四川乐至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注5·3·16：四个第一、文攻武卫，林彪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时提出“四个第一”：武器和人的关系，人的因素第一；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第一；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第一。文革初期的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提出了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注5·3·17：韦国清（1913·9·2—1989·6·14），文革中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壮族，广西东兰县人。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递补），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注5·3·18：许世友（1905·2·28—1985·10·22），文革中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河南信阳人。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后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注5·3·19：滕海清（1909·3·3—1997·10·27），文革中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安徽省金寨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注5·3·20：黄永胜（1910·11·17—1983·4·26），文革中先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广东省革委会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湖北咸宁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注5·3·21：见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载《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1期

注5·3·22：见江苏电视台原台长丁群：《冤狱遍地的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载《文史精华》2009年第1期，总第224期

注5·3·23：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注5·3·24：见白音太，《“内人党”冤案前后》，《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8期

注5·3·25：引自《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中整办1983年11月16日《整党通报》第4期

注5·3·26：陈锡联（1915·1·4—1999·6·10），文革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湖北省红安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中曾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初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吴德（1913—1995·11·29），文革时为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丰润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曾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增补），第九届中央委员，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忠，见注3·1·21。纪登奎（1923·3·17—1988·7·13），文革时为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山西省武乡县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曾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建勋（1913·10—1983·4·23），文革时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沧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政委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增选）、委员（增补），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注5·3·27：万里（1916·12—2015·7·15），文革时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山东东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注5·3·28：黄克诚（1902·10·1—1986·12·28），湖南永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后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后为中纪委第二书记。

注5·3·29：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注5·3·30：张爱萍（1910·1·9—2003·7·5），四川达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未完待续）

□ 摘自《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明镜出版社，2017年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